

汪民安 著

福柯的界线

The Limits of Michel Foucault

南京大学出版社

B565. 59/29

2008

福柯的界线

The Limits of Michel Foucault

汪民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柯的界线/汪民安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

(当代学术与批评)

ISBN 978-7-305-05311-5

I. 福… II. 汪… III. 福柯, M. (1926~1984)—哲学
思想—思想评论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9678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与批评
书 名 福柯的界线
著 者 汪民安
责任编辑 杨全强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9.5 字数 231 千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311-5
定 价 26.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导 论

如果不是将疯癫理解为神志错乱的自然疾病,而是将它理解为启示般的诗篇的话,我们可以在福柯华丽的开篇中预见到他这一伟大事业的基本倾向:对规范的逾越,对理性的抗争,对超验性的拒斥,对诗意的渴望,对极端体验的迷恋。而疯癫则令人惊异地理伏着所有这些倾向的最初种子,他日后二十多年的事业正是从疯癫这里发芽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疯癫主题并非福柯的有意选择,这个大学体制长期遗漏的主题对于福柯来说近乎天命般的召唤。疯癫不仅在现实中沉睡,在哲学中也同样沉睡。福柯正是要借助疯癫揭示出西方文明的一个特有的理性—疯癫维度。乔治·巴塔耶说:“疯癫是理性的反题……疯癫本身提出了自由‘主体’的某个观点,那个观点不服从于‘真实的’秩序,而只是着眼于当下。”疯癫想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没,就需要藐视理性的权威,因为理性意图长久地对疯癫维持着自己的父亲形象,它要降服疯癫,它要用暴力和惩罚驾御疯癫。而福柯正是要重现疯癫的抗议激情,要让沉默的疯癫恢复它的呼喊。福柯在疯癫风雨飘摇的历史中,暴露了理性漫长而隐秘的道德禁锢,像尼采一样,他让疯癫的尖叫,闪电般地划破理性的夜空。疯癫的尖叫,也是一切孤独者的尖叫,是潜伏在日

神之下的酒神的尖叫。理性和道德，这是福柯与之搏斗终生的陈腐教义。开始，福柯向它们发出了大海般的咆哮，然后，激烈的咆哮缓缓地平静下来，最后的福柯变得安详了；安详并非激情的消减，而是吞噬危机的镇定。福柯无意做历史的巨人，他只想成为一名保罗·维尼所说的今天的战士。巨人是山呼海啸式的，战士则是缄默无闻的；巨人是立法者，战士则蔑视一切的律法；巨人是权威，战士则是探索前行的英雄。

这种探索前行是一种僭越，对理性的僭越，为此，福柯对多种多样的理性形式、与理性相关的种种观念作了历史的清算，考古学和谱系学正是他独特的历史清算方式，这个尼采的当代信徒将历史的成见一一瓦解，他深入到历史的每个角落，历史不再是统治者、英雄、帝王、国家机器、战争周旋于其中的盛大舞台，相反，历史表现为支离破碎的纷乱细节，福柯勾勒了诗人、疯癫、小偷、流浪汉、倒错、反常、罪行、逾规者的曲折而隐秘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总是蕴含着无穷无尽的争斗，历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时间线索，它还表现为一种权力四处出没的空间，权力正是围绕着疯癫、罪行、倒错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禁闭和生产形式，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真理形式。医院、精神病院、监狱、工厂、兵营、家庭在福柯的历史考古中纷纷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它们不是保护性的，而是控制性的；不是宽恕人道的，而是隐含暴力的；不是平息骚扰，而是激发骚扰；不是平静的治理，而是权力的游戏。在所有这些机构中，都遍布着规训的权力。福柯对于历史中的常识、成见进行了无休止的反复敲打，谱系学不是一种故意的历史颠倒，而是将权力和利益的纷争视作是历史的基本动机。这样，历史中不再存在着某种不容置疑的真理和本质，历史不过是一场相对主义嬉戏。对于历史的书写，各种各样的知识形式并非纯洁中性的，而是时时刻刻受到权力的污染。福柯就这样将哲学主题引入到历史中，他既改变了一般哲学的面貌，也改变了一般史学的面貌，哲学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探索，它是一种全新的哲

学,是摆脱了哲学史的哲学,摆脱了哲学家恐怖的哲学。同样,这也不是抱有还原信念的史学,历史不再是顺势而下的江河,不再是一堆史实活蹦乱跳的欢快串联。在福柯看来,理性和理性的他者、权力和权力的对象的冲突就是历史的旋律,既然不再存在着标准的真理,为什么历史要动用全部的力量来压制那些叛逆和越轨呢?为什么不能从历史中释放出异质性来呢?为什么不能以别样的方式来重写历史呢?

为此,福柯的写作充满着激烈的申诉,他既是高亢的,也是绚丽的;既是热烈的,也是偏执的。但是他那烂漫的申诉散文并没有因为激烈而失去分析的力量,福柯的哲学天衣无缝地将抒情和分析融合起来,他既是澎湃的诗人,也是严谨的智士。福柯的分析,他对对象的层层盘剥、出其不意的叩问、阴郁有力的描述,永远都是对常识的动摇。这几乎没有丝毫的陈词滥调,相反,他总是以一种奇特的目光把人们引向理性的断裂边界。福柯的分析表现出一种神秘的穿透力,它不可思议地将对象置于死地,这是真正的艺术,是一种令人着迷的才华。这确实是最伟大的现代哲学,它不仅构成一种美学,而且还产生巨大的震撼。福柯所特有的抒情性,总是贯穿于他那独到的分析中,它是分析的强化,它将分析缓缓地推到了力量的巅峰,分析因为夹带着抒情,它就不是逻辑式的数学推论,但是,抒情决不是放纵,而是恰到好处的节奏控制。这样的哲学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枯燥,没有流露出净寂主义的冷漠。相反,它既是生动的,又是有力的;既是愤慨的,又是抗争的;既是忧郁的,也是欢乐的,这是哲学,同样地,它也是诗篇。

这是一种令人激动的哲学,贯穿于这种哲学始终的是权力问题和主体问题。福柯堪称是最重要的权力理论家,但是他并没有一个牢固而确凿的权力理论,相反,他在“权力”面前反复徘徊、权衡、测量,他在“权力”问题上进行了残酷的纠缠。权力,在福柯这里最终表现为一个开放的场域。起初,他将权力视作是否定、压制、禁闭性的,权力是一种

让人窒息、让人收缩、让人丧尽自由的东西。在疯癫的历史中，权力就扮演了这样一种暴君角色，这样一种权力论在本质上同国家模式、集权模式、统治模式、法律模式的权力观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它们都是某些主体所拥有的压制性和惩治性力量，它们都可以以暴力的方式运转和施展。差别只是在于，权力实践的范围，运作的对象领域，惩治的暴力程度不同，福柯的权力更具有弥散性、更小型化、更隐蔽，它的实施对象更边缘化，权力和它捕捉的对象处于一般历史之外，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禁闭权力。后来，福柯采用了尼采的权力观，他不再将权力视作否定性的，而是将权力确定为积极、主动、生产性的，权力锻造和铸就了它的对象。福柯也不再将权力视作是某个组织、集体或者个人的所有物。权力没有中心点，没有主体，没有机构，它不是单向性的，它永远存在于关系之中，存在于和别的权力的关系中。它是这些关系的依靠、较量、连接、分裂、争斗；权力来自四面八方；它无处不在，正是权力的结合或者纷争才构成了巨大、复杂而纷繁的形式本身，社会机制正是权力的战略形式，而身体和性，这些自然而然的东西，在福柯看来，都是权力的效应和产物。

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中，主体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福柯否认了权力是主体的所属物，相反他颠倒了它们的关系，主体是被权力造就和生产的。如果权力是否定性的，主体当然就受到了它的排斥，这样一种权力将主体划分为几种类型：理性的和疯癫的，同性恋的和异性恋的，罪犯和守法者，等等。不过，福柯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权力对主体的划分。在《事物的秩序》和《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不是借助压制性的权力来宣布主体死亡的，而是将人的死亡同语言存在的兴起联系起来，同人文科学、知识的彼消此长联系起来，语言的地平线湮没了人的痕迹。人，福柯耸人听闻地宣称，不过是历史的某个特定时期的知识发明。既然它的出现是偶然的，那么，它的消失就是必然的。在此，主体

是一种知识俘获的对象,是一种科学的对象。它的形成、构型,它的所有观念都是缓缓地进入历史的,当然,它也会在某一时刻,再次消失于历史之外。但是,福柯不久即不再在知识、语言、话语,也即是说,不再在考古学的限度内谈论人和主体,他从谱系学的角度谈论主体,从权力的生产性的角度谈论主体,福柯关注的问题是,权力是以怎样的方式造就了形形色色的主体形式的。这时,这个主体完全受制于权力的锻造,屈从于匿名的权力,它无时无刻不在被规训和造就,它只能是“驯顺的身体”,最终,主体不过是支配身体的权力技术学的效应。

但是,倘若真的陷入这种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的部署中,真的对权力无所适从,真的被锁进铁板一块毫不松动的统治性中,我们能够产生一种风格化的自我吗?如果我们在权力面前难以喘息,那么只有两条道路可供抉择:要么放弃一切努力,听凭权力的肆虐,对于福柯来说,这也意味着他的事业的无望和中断;要么将眼光投向历史的源头,投向权力尚未大肆浸染的地带,看看在那个瞬间,在权力尚未膨胀的历史瞬间,发生了什么。为了渡过由于权力引发的危机,福柯像他心智上的导师尼采一样,开始了他的希腊之行。福柯回到了希腊—罗马古风,这种回归不是对现时的逃避,同样也不是要求现时搬回那些历史尘埃中的伦理大任,相反,历史总是现时的某种启示、某种谱系:福柯对过去的回归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它的远离,古人的自我风格化在当前的语境中如何产生一种迥异的存在艺术式样?对于福柯来说,古人的风格化模式和手段,他们创造自我的途径已经无关大局了。重要的是,他们自我风格化的态度和意志,他们改造自我的愿望,将自身塑造成艺术品的气质,所有这些对自我的批判和置疑的态度才是福柯暗自心仪的。福柯的自我风格化主题既贯彻于他最后的思索中,也贯彻于他的实践中。自我风格化,自己像创造艺术品那样创造一个独特的自我,或者说,存在美学,所要奉行的唯一原则,就是解除超验性和普遍性原则,也就是

解除真理的魔咒。这或许是福柯终生的主题，它不过在福柯的最后岁月越来越清晰而强烈地浮现出来。福柯此时想到的不是古希腊—罗马的贵族，而是波德莱尔式的花花公子，这些花花公子正是要全力以赴地将生活变成艺术，这是一种存在伦理学，生活不再以超验性真理为目标，它是一种可能性的探究，是一种不倦的修行，无止境的摸索，自我的反复批判，这不是面对着某个顶点一步步拾级而上，这是一种非求真性的跳跃，是自我控制的技艺，是非理性的美学，最终，这是尼采式的舞蹈。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理性/疯癫	1
一 疯癫史	1
二 疯癫氛围	10
三 疯癫与空间	18
四 疯癫与结构	27
第二章 话语/知识	45
一 医学的语法	45
二 知识型与语法	53
三 表征的考古	60
四 人的诞生和死亡	76
五 知识的自主和回归	94
六 考古学和陈述	104
七 话语的控制	127
第三章 权力/身体	136
一 谱系学和身体	136

二 惩罚的结构和实践	161
三 规训社会	175
四 性的再生产	192
五 生命权力、治理和种族	198
六 权力、抵抗和战争	213
七 权力和理性	229
第四章 伦理学/美学	243
一 牧师权力	243
二 自我的界线与启蒙	251
三 自我的技术与快感	262
四 生活的艺术	279
参考文献	286
后 记	293
再版后记	295

第一章 理性/疯癫

一 疯癫史

《疯癫与文明》抛弃了有关疯癫的一般知识，疯癫不再是一个牢固而稳定的本质主义概念，疯癫史也不再是叙述一个有稳固所指的疯癫的历史行程。这里，疯癫和历史都是动态、生成和演变的，它们相互作用，不仅仅历史在变化，疯癫概念本身也在变化。福柯的疯癫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争斗、交流、冲突、断裂的历史，疯癫不是独自地裹足前行，在这个疯癫史中，疯癫总是伴随着其对立面理性。理性在疯癫的历史行程中如影随形，可以说，《疯癫与文明》不纯粹是一个疯癫史，而是疯癫与理性的交流、断裂、争斗、对话、镇压和征服史，这是疯癫置身于其间的空间史，是血雨腥风的空间史。这样一种关系史注定了疯癫命运的动荡和飘摇。

福柯将疯癫与理性的关系史最早追溯至中世纪对麻风病的排斥那里。在中世纪，麻风病盛行，麻风病院遍及整个欧洲，欧洲通过麻风病院的隔离方式来对付麻风病人，正是这种隔离，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使麻风病消灭了。但是，麻风病院所采用的隔离和排斥方式、对待麻风病

的习俗则留存下来。同样,中世纪附着于麻风病人身上的价值观、意象、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①也留存下来,正是因为这些可怕的意义,才使这些形象得以固定起来,进而被排斥出去。排斥是中世纪开始的,它划定了一个空间(麻风病院),意在实行拯救,中世纪通过这种排斥获得拯救的方式,在两三个世纪之后的古典时代对待疯癫的行为中再次浮现。

不过,在中世纪时,疯癫是个一般的经验,是一个平庸和默默无闻的现象,它表现了愚蠢,但它在一个庞大的愚蠢和罪恶体系中占据着不显山露水的一席。只是在中世纪结束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才变得夺目,它在欧洲文化的地平线上开始成为一个重大现象,“其意义暧昧纷杂:既是威胁又是嘲弄对象,既是尘世无理性的晕狂,又是人们可怜的笑柄”^②。在故事和道德寓言中,在学术作品中,在造型艺术中,在文学中,在哲学中,疯癫都成为中心意象,它在各方面都使人们迷恋,它可以以滑稽方式造成喜剧效果,可以用呆傻语言说出事物的真相,可以在和理性的辩论中获得胜利,可以在同死亡的较量中消除死亡的威胁。“疯癫变成了诱惑:它体现了不可能之事,不可思议之事,非人之事,以及一切暗示着大地表面上的某种非自然的,令人不安的荒诞存在的东西”^③,正是它的这种荒诞形象,这种神秘玄奥,疯癫还是一种知识,一种智慧的预示,它所揭示的是“一个秘密,一个无法接近的真理”,“地狱的无情真理”,^④因而,疯癫是启示性的,人们正是借助疯癫,表达了对凶兆和秘密的直觉般的领悟。

与此同时,文艺复兴时期也将疯癫看作是最大的恶习和人类弱点,

①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

② 《疯癫与文明》,第10页。

③ 《疯癫与文明》,第17页。

④ 《疯癫与文明》,第19页。

但是,这是没有危险的恶习和弱点。疯癫并不危险,它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是一个普通景观,它常常游荡于大街小巷而不对人进行隐秘的伏击。不仅如此,疯癫还被浪漫化了,它有时表现出狂妄自大,有时表现出情欲的绝望,有时表现出正义的惩罚。最重要的是,疯癫与梦幻、错觉密切相关,它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它“有吸引力,但仍蛊惑人,它统治着世上一切轻松愉快乃至轻浮的事情,正是疯癫、愚蠢使人变得好动而欢乐”^①,而不是恐惧和惊讶,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和疯癫的一个愉快交流。此时,疯癫并没有作为一个异质性的他者被欧洲文化排挤出去,相反,疯癫,因为它特有的启示性、幻觉、啼笑皆非、善意的过失、痛苦、悲剧乃至死亡,而引发了压倒性的迷恋。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除了不包括危险外,它包括一切。

但是,很快,对待疯癫的恶意抬头了。文艺复兴之后的古典时代不再友善地对待疯癫,它不再和疯癫愉快地交流了。在17世纪,禁闭所大量产生,在巴黎,每一百个人中就有一人遭到禁闭,而疯人的归宿既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街头,也不是在被放逐的茫茫大海上,而是在高墙耸立的禁闭所内。福柯将1656年建立的巴黎总医院作为古典时代对待疯癫的一个标志性记号。巴黎总医院不是一个医疗机构,不是疗效式的,而是一种“治安”手段,是一种禁闭所。这种总医院模式经过发展,在18世纪的欧洲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网络,它们将违法者、浪子、游民、精神病人都囚禁在高墙之内,囚禁行动采纳的是权威主义的强制形式,目的是制止“行乞和游手好闲”^②。在此时的欧洲人看来,正是因为这两点,才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因为游手好闲和懒散在古典时代被视作是造反,是最恶劣的行为,是一切祸根之首,它是对“上帝的统治反

① 《疯癫与文明》,第21页。

② 《疯癫与文明》,第43页。

叛,它领导和压倒了一切恶习”^①。这样,禁闭所以对游手好闲者和流浪乞丐进行肉体 and 道德的束缚,它迫使他们劳作,给他们提供工作,它试图用工作来消除游手好闲,用劳动来消除失业。但是,从这个动机——经济和实用价值的动机——来看,福柯表明,禁闭所是失败的,是工业化初期的一种笨拙而无效的救治和社会防范措施。但是,对于福柯的论述而言,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禁闭表现出了伦理和道德维度,而不仅仅是经济维度。在古典时期看来,劳动有一种赎罪的力量,在劳动中,罪恶得以消减,道德得以升华。即使是无用的纯粹耗费的劳动,也是一种驱恶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疯子和游手好闲者一样被禁闭起来,他们一样地被强迫劳动,“到了古典时期,人们第一次通过对游手好闲的谴责和在一种由劳动社会所担保的社会内涵中来认识疯癫”^②。在此,疯癫不再带有非理性的烙印,也不是和无拘无束的想象相关,它既不再是神秘的启示象征,也不是人们善意的捉弄对象,相反,它是一个懒散的形象。疯癫之所以被驱逐,被隔离,被排斥,被禁闭,正是因为它懒散,因为它越出了劳动的神圣权力之外,越出了以劳动为基础的神圣伦理界线之外。疯癫被禁闭,不是因为它的非理性,而是因为它的反劳作,非道德。

禁闭所因而不仅仅是强制性的劳动机构,它还是个道德机构。它通过劳动来实施道德改造和道德训戒。禁闭所的发明,正是古典时期资产阶级美德憧憬的流露,在此,道德被视作是理想,是要事,是律令,禁闭正是用暴力压制那些反道德的社会要素,用劳动让他们的道德升华,让他们迷途知返,让他们重获拯救。疯癫和游手好闲者一样被禁闭起来,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伦理的原因。就前者而言,“人们是从贫

① 《疯癫与文明》,第 51 页。

② 《疯癫与文明》,第 53 页。

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就后者而言,人们是从与劳动相关的伦理价值的角度认识疯癫。在古典时期,人们对疯癫的认识和体验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在此,“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的对狂暴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这样,疯癫就被从想象的自由王国中强行拖出,它被关押起来,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①

但是,古典时期被禁闭的疯子同其他的被禁闭者受到的对待并不相同。禁闭被认为是对耻辱的避免,对丑闻的掩盖,对罪恶的遗忘,因为罪恶被认为是有传染性的,只有遗忘罪恶才能遏制罪恶,因此,罪恶在禁闭所里被隐藏起来而不昭示于众。但疯子则是唯一的例外,疯癫被展示、被参观、被表演,疯癫丑闻没有封闭起来,而成为公开的娱乐,成为注意的焦点,成为隔着栅栏观看的对象,它受到理性的监督并与理性隔离开来,它成为与理性无关的奇特动物,“疯癫借用了野兽的面孔”^②。疯子被视作是动物而不是病人,疯子的发作被认为是动物兽性的狂吼,因而无论是医学,还是教化,都不会光顾疯癫。驾驭疯癫只能靠纪律或残忍。疯癫之所以被展示,正是为了表明“人类的堕落如何使他们接近兽性,上帝挽救人类的仁慈能远及何处”^③,在古典时代,人们是以非理性为背景来认识疯癫的,疯癫是非理性的经验形式,被视作是理性的他者,是一种虚无,是对理性的否定,是非存在物的荒谬表现,“禁闭的目的在于压制疯癫,从社会秩序中清除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④,禁闭因而可以视作是理性对于疯癫的把握,理性对疯癫的秘密结构的勾勒。禁闭正是在理性和非理性,存在和非存在,日光和眩

① 《疯癫与文明》,第 57—58 页。

② 《疯癫与文明》,第 66 页。

③ 《疯癫与文明》,第 74 页。

④ 《疯癫与文明》,第 106 页。

惑,白昼和黑夜之间划出了一个不可约减而又泾渭分明的沟壑,这种对立而不妥协的反辩证的二元关系正是古典主义思想图式的要旨所在,因而,将疯癫禁闭起来对于理性而言是最自然、最恰当、最自发的排斥手术。禁闭,这是古典时代的天命。

当然,古典时期,尤其是在18世纪的进程中,禁闭的实质和意义在发生改变,不断地要求将疯子和其他的被禁闭者分隔开的呼声日益强烈,这是因为在同一个地区的禁闭所里,疯癫对其他的罪犯——如自由思想者、政治犯、商人、堕落的老人等——产生威胁,构成恐惧和惩罚。疯癫既是被惩罚的对象,同时又是惩罚他人的主体,既是压迫的目标,也是压迫的象征。因此,疯癫应成为各种禁闭的典型对象,它和其他的禁闭者分离开来,它获得了另一种禁闭意义,即与禁闭牢不可分的本质意义,疯癫就意味着禁闭,疯癫成为禁闭的唯一理由,而另一部分,原先与之相连的禁闭者,如贫困者和游手好闲者则被一种新的道德眼光打量着,它并不属于违反劳动伦理意识的罪恶世界,现在看来,它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是经济事实而非伦理事实的结果。因而,贫困应从与疯癫的联系中解脱,从道德的审判中解脱,最终,应从禁闭所中解脱。这样,只有疯癫“被孤零零地留在令人窒息的禁闭高墙之中”,它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它从前从未提出的问题现在纷至沓来。它使立法者陷于困境,他们不得不用法令来结束禁闭,但是不知道在社会领域内何处安置疯癫:监狱、医院,还是家庭救济?”^①正是在处置疯人的犹豫不决中,精神病院诞生了。在18、19世纪之交,新的精神病院单独收留了疯子,同时,它也创造了不同于禁闭所的体验疯癫的结构。

福柯集中地分析了图克和皮内尔建立的疯人院,在这个专门处置疯人的休养院里,有一套特殊的治疗方法和对疯癫的独特体验。在图

^① 《疯癫与文明》,第217—218页。